

五邑大学文学院学人文丛

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

以复辅音声母为中心

庞光华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五邑大学文学院学人文丛

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

以复辅音声母为中心

庞光华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 以复辅音声母为中心 / 庞光华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668 - 1030 - 4

I. ①上… II. ①庞… III. ①汉语—上古音—复辅音—声母—研究 IV. ①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0713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1510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 19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成果
本书的出版得到“五邑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序

我与光华相识是在上个世纪末。在我的“说文解字研读”课上，有一个坐在前排、身边放着一个拉杆箱（里面都是书，以后他每次上课都带着这个拉杆箱）的人，不是班里的学生，下课后他到讲台跟我说，他是北外日语中心的硕士，对中国古代文化及文字音韵训诂十分感兴趣，想做这方面的研究，便来听我的课。当时我们的课是可以随便旁听的。他听了“说文解字研读”和“淮南子研读”，后来就去广东的大学工作了。2002年他考取我的汉语史博士生，攻读汉语史博士学位，毕业后去香港科技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又去马来西亚的大学教书，现在任教于广东五邑大学。光华从日语转入汉语，跟他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有很大关系，而且，日语的研究对他研究汉语史，又有很多裨益。

光华笃志学问，他的精力几乎完全放到了做学问之上，摒弃了世俗利益的诱惑。他与我的谈话，除了学问，还是学问，似乎从来没有谈过生活上的事，即使春节时打拜年电话，有时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内容还是他近期做学问的情况或他对某一学术问题的想法。光华做学问的兴趣十分广泛，涉猎语言文字及文史哲各个方面，有人说他的文章读起来比较吃力，就是因为他引证广博。

光华很看重传统学术精神及方法的继承，尤其是对清儒的朴学精神赞赏有加。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十分近似的看法。我曾经说过，中国语言学应该沿着中国自己的道路不断地前行，所谓中国自己的道路就是清代学者开辟的以朴学为基础的道路。朴学是以事实为研究对象，以事实为研究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得出结论。这种结论往往是可靠的、坚实的。然而近若干年来，中国语言学似乎背离了这样一条路，几乎被西方各种不着边际的虚妄的所谓理论左右。光华的著作，他的治学精神，是沿着朴学的道路前行的，这使我们看到，有良知的中国学者还是大有人在的，这也许就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希望。

光华的博士论文是对古有复辅音声母的批评，他从多方面、多层次对上古不存在复辅音声母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现在这本著作，就是他对博士论文《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的增补及某些修订，使原来的某些看法更加深化，材料更加丰赡。我觉得，这本书的长处主要在于：

一、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是正确的。他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材料，是上古文献。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目前，更显得难能可贵。

二、能多角度、多层次讨论汉语上古音没有复辅音声母的问题，有些是他人所忽略、不曾注意的，如汉字形体变迁的问题，异字同形的问题等。

三、能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立论或驳论都能言之有据。

四、文章从音理上对于多组声母相谐的问题，如明母与晓母、晓母与心母等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有力地证明这些都与复辅音声母无关。

本书的第四章“音韵学相关问题研究”，不是他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是对音韵学一些个别的具

体的问题的一些看法。我曾经建议他将之作为另一本书单独出版。考虑到现实出版界的状况，就只好放在一起了。

我已经退休多年，对复辅音声母的问题，没有很多关注。光华请我作序，就写了上面几句，姑且算序吧。

张双棣于北京博雅西园
2014 年 11 月

自序

拙著《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出版后，陆续发现了一些错误，需要订正。恩师何建章教授和畏友萧旭先生帮我校订错字最多，我十分感谢他们热忱的帮助。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和研究，收集了不少新材料，也借此机会增补进去。本书实际上是《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的增补改订本，与旧著相比，自以为有较大的改善，明显地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希望学术界的朋友在讨论有关问题的时候尽量以此版为准。新增加的参考文献大都在书末补入了，只有少数新增补的文献随文出注，未能在文末的参考文献中逐一详尽地排列^①，这是要向读者告罪的。增补的材料有不少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做博士后访问学者期间收集的，我十分感谢张敏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个如此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恣意参考香港各大学的中文藏书。我在马来西亚教书时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在吉隆坡的那段时间，虽然我的心绪只有孤苦寂寞，但对基于汉藏语系同源词的汉藏对音的批评性研究^②、对《说文解字叙》中的“转注”的解释，都是那个时候做出的。新版较初版已超出五十万字，全书100多万言，主要是增补材料，使内容更加丰满，一些不成熟的提法已尽可能得到修正，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我博士毕业后数年的心血尽萃于此，但不如人意的地方还是很多，有些问题还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有的判断仅代表我目前的认识。若干年之后，不知能否再出修订本。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杨宽先生《战国史》、何建章师《战国策注释》、张双棣师《古代汉语字典》、蒋绍愚师《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张永言先生《语文学论集》，甚至大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编》，这些论著都经过千锤百炼，不断补订，足以垂范后学。四川经学家廖平对自己的经学观点一生改订过六次；日本学者编撰的辞典之类工具书从来是不断修订，有的甚至有十几版。美国语言学大家乔姆斯基一生不断改订发展自己的语言学说，在他有一本书出版一年后说：“由于学术的快速发展，此书需要修订了。”乔姆斯基的学说历来受到很多批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我在此书中对一些学者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偶尔还较严厉，但我决不抹杀这些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他们中有一些学者献身学术的精神令我感动，如郑张尚芳先生，尽管我对郑张先生的《上古音系》一书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我曾经是日语专业出身，受教于许多日本学者，我的硕士学位论文^③的指导教官是东京大学的神野志隆光教授，日本学术界中存在激烈的学派对立，但我实在不希望中国学术界也这样。学术的百家争鸣不是生死抗争，学术上的错误人人难免，只要这些错误是诚实的。我自己在本书的初版中打磨不精，犯的错误不少^④，感到非常惭愧和悔恨，我下定决心要努力在本书中予以修订。在古汉语研究中，古文字和上古音是很容易犯错的两个领域，学术界的同行似应彼此宽容，以善意的讨论代替无情的攻伐，尤其不能抓辫子和打棍子。我生平很喜欢《左传·宣公十二年》的一段话，讲的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将荀林父率军救郑，与攻破郑国的楚军在黄河边的邲城决战，但因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军令不统一，最终兵败。荀林父回国向晋景公请死。这时晋国大臣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

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这段话可算千古名言。一个真诚的学者即使在学术上犯了大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

但如果学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犯了严重的过失,还一味敝帚自珍,死不认错,视陈说如性命,拒绝与时俱进,这就不是学者态度。不幸的是,现在敝帚自珍的学者似乎太多,很少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如果学者只会死要面子,不肯真诚地探索真理,我们的学术就不会走向光明。

近年来,我颠沛流离,忧世伤生。虽然费了五年的光阴来完善此书,但有好些感兴趣的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古文献学、神话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⑤的论题没有工夫来做,想翻译的很多日文论著也没有着手,《诗经兴义论考》《汉字语源学》二书至今没有完成,实在愧对师友。面对沉香斋的四壁图书,唯有祈祷苍天假我年寿,以完成我的著述,并进一步改正我的错误。

本书涉及的内容有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详细地列举了相关材料。这是因为上古音和汉藏语系的问题要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非得有多学科、多角度的配合研究不可。每一个学科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独自的考察。^⑥我列举的这些多学科的材料和相关论述是为了证明:第一,远古时代的西藏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独自的文化,因此,汉语与藏语即使真有同源关系,二者的分离也在距今万年以前。从而不能根据汉藏语同源的假设来做汉藏同源词对音研究。第二,远古时代的西藏与其他民族之间已经存在文化交流,因此不能说西藏从来都与外地文化隔绝从而易于保留远古音。第三,藏缅语民族与汉语民族在历史上有长久的交流,因此,二者之间发生语言上的相互影响是非常自然的。二者的关系词与其解释为同源词,不如解释为借词。第四,汉语民族从远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很开放的民族,非常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同时也融合并汉化了许许多藏缅语民族和阿尔泰语系民族,这些异民族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其民族汉化的同时也被带进了汉语。比如,我在本书中认为存在内爆音的汉语方言的人群其上古时代不是汉民族,而是古百越语民族,在其汉化的过程中将本民族固有的内爆音带入了汉语。从内爆音的角度,我大胆推断汉语和壮侗语不同源,从而倾向于白保罗的观点(虽然我否定汉藏对音),而与李方桂、邢公畹等学者的看法不同。我相信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综合研究肯定是将来音韵学研究取得进步的一大发展方向。我在这诸多方面的工作并非《文心雕龙·铭箴》所谓“水火并灶,繁辞不已”,而是鉴于《淮南子·要略》所称:“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纷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

庞光华 识于沉香斋
2013年5月

注释

①主要是因为有的材料太琐碎,我在本书中只提到名称,没有引述。

②见本书第一章第八节。

③日文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神话的比较研究》(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④举一个我在研究中犯过的错误: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17页:“往骨器、象牙器上镶嵌绿松石,在大汶口文化中即见到过,往玉器上镶嵌绿松石,则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不仅有镶嵌绿松石的玉器,

更有镶嵌绿松石的铜器，且工艺精美绝伦。”我国考古发现了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参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10页）。在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个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还有用绿松石装饰的青铜器。我曾经在没有深入广泛地考察的时候就认为我国并不出产绿松石，上古时候的绿松石当是来自古代的伊朗地区或西伯利亚（关于“绿松石”的概况，可参看《大英百科全书》的“turquoise”条。又名“土耳其石”，其名称就与“Turk”相关）。我因此认为在夏代以前，汉民族和远方异民族就有文化交流。后来读到章鸿钊《宝石说》卷三“绿松石”条（《石雅·宝石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绿松石出土久远，中国往古早有用之者，惟未详其名。最近河南孟津出土之绿松石珠，每于其锐端穿一小孔，形如耳坠。……瑞典安特生氏于1923年至1924年在甘肃古墓中得绿松石珠甚夥，形状大小不等，有孔甚多，亦或无孔。安氏从其余石器陶器等察之，谓其时代约当夏商之间。两地出土之遗物，前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矿产陈列馆曾收藏其一部。河南殷墟出土中亦有绿松石，则明出周以前。又辽宁旅顺老铁山郭家屯出土之石器亦有以绿松石为之者，其时代虽不详，论者每谓当归诸春秋战国以前云。凡此皆中国古昔之物，而视其遗迹，似愈西而用之愈早，且其制作亦愈精，则其来源之所在，或不难退察得之矣。”从章鸿钊先生的这段论述来看，我国上古时代的绿松石很可能是来自中亚地区。据同书同节，我国现在探明的矿石场中，只有湖北襄阳产绿松石。但据同书第513页所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陕西兴安州天柱山下很可能出产绿松石。我现在感觉到我国远古时代的绿松石很可能来自湖北襄阳和陕西天柱山，不一定来自古伊朗。最近的考古学发掘更进一步证实了我国上古有自己的绿松石。据许宏等人《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一文的介绍，在2004年对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发掘中，“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数千枚绿松石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证实了我国自二里头文化时期就确实有了自己的绿松石制造作坊。因此，我国自远古以来的用绿松石作为装饰的习俗与古伊朗地区无关，虽然后者也出产大量的绿松石。

⑤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兴趣主要是在上古时代。我一向认为我国上古时代与外民族已经存在很多文化交流，我们伟大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而是一个融入了世界文化的民族。我很感谢曾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我中外文化交流史课程的张志老师，因为是张老师唤起了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这门学问的兴趣。张志老师当年（80年代末期）鼓励我努力学外语，一再对我说：“学日语很有用，另外还要把英语学通。”张老师自己通晓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还懂意大利语、拉丁语。在北外懂外语最多的教授是张老师和姚小平，而不是许国璋或王佐良、周珏良。张老师对各种外语词典的优劣得失很有见解，经常跟我说日本学者编撰的词典天下第一。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张老师对我说：“日本学者编的《梵和大辞典》很重要，你在日本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把这本书买回来。”我后来在日本用2万多日元（当时大约等于1600元人民币）买了一部新版的《梵和大辞典》（讲谈社，1996年。本书多次引用），回国后对张老师说起此事，张老师夸我有出息，说我舍得为学术花钱。在1997年底北外国际交流学院举办的一次关于国际汉学研究的讨论会上，我最后做了长篇的即席发言，主要是呼吁研究国际汉学的学者不仅要有过硬的外语功力，还要有相当的国学修养。如果对一篇中文的学术论文都不能吃透，那么面对用外语写出的论文我们怎能判断其价值呢？同时，我强调对外国学者研究汉学的论著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一味吹捧，我当场还举了一些例子。张老师会后称赞我的发言是：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很有启发性。遗憾的是，我十年前所批评的现象现在不但没有多少改观，反而越来越坏了。张老师有一回也批评我有时太狂，说我在有的学术讨论中批评他人的时候只管学术，不留情面，容易伤感情。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变乖了很多。张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尤其重视从语言的角度来发挥，强调对语言间的借词的研究是研究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因为文化的载体最重要的是语言。例如，他提到俄语的词汇中对中国的称呼是来源于我国古代北方的强大民族“契丹”这个名称；他说我国称俄国为俄罗斯是来源于蒙古语对俄国的称呼，俄国人并不自称其国名为俄罗斯。还提到汉语中有许多常见的词汇都是从佛经中来的，不读佛经将不能充分理解中国文化。他非常重视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他有时给我们讲一些掌故，说：北京的长春街是为了纪念宋末元初的道教徒长春真人丘处机而命名的；法国天才学者伯希和在赴俄国的旅程中学会了俄语；陈寅恪留学欧洲的时候很穷，但学会了二十多门外语；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是很重要的名著。可惜天妒英才，张老师在外语上用功过度，

好些学术见解来不及著述，却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不能写作了。在我手中仅仅存有张老师编的教学参考书《中外文化交流史资料简编》，其中选了很多英语原著。他曾对我说他本来选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论著，但由于排版的问题，日文资料后来全部删除了。言谈间，他深感遗憾。我对日汉对音的最初了解是在张老师的课堂上，我能够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上轻松地分别尖团音声母和各种入声字等等，也是张老师教育的结果。我2005年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的时候与马铭兄去张老师位于北京黑龙潭的家里看他，见到张老师已是老态龙钟，面容消瘦，双手不停地颤抖，话语低沉，进食都很困难。那时的情景使我恍然想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祖当年能够从人的生老病死中悟出人生的空虚和痛苦，想到将来的某一天我自己也会有同样的遭遇，我不禁悲从中来。2008年1月，张老师在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之后，往生彼岸了，我为老师祈祷冥福。

⑥2005年7月6日《科学时报》上《中国科学家对生命起源多个难题做出统一解释》一文中有一段称：“生命起源与物质起源、宇宙起源和意识起源一道并称当今四大基本科学难题，是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之一。由于其高度交叉性，涵盖的学科领域包括化学、生物、地质、考古、航天、数学及物理等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生命起源研究是一项古老而又充满挑战的综合性前沿领域，许多具体的生命科学难题均由其衍生而来。”现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多学科配合的结果。我相信汉藏语问题的精密研究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研究，这不是纯粹依靠同源词可以解决的。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据2007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上一篇文章《德国科学家研究称气候变化加速唐朝灭亡》称：“据新华社1月3日电：德国研究人员发表研究报告说，罕见的季风期异常导致唐王朝统治晚期灾荒连连，进而作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加速唐朝灭亡。德国研究人员格拉尔德·豪格认为，湖泊沉积岩岩心中钛元素含量和磁性是相应历史时期冬季季风强弱的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冬季季风期和夏季季风期交替，在夏季带来丰沛降雨，冬季则相对少雨，气温也在一定幅度内变化。但在最近1.5万年中，曾3次出现冬季季风过强而夏季季风过弱的异常现象，每次都会导致一段异常寒冷的时期，其中前两次出现在最近一次冰期，最后一次就出现在公元700年至900年，与唐王朝统治时期部分吻合。唐朝统治始于公元618年，结束于907年。豪格领导的研究团队从广东湛江一处湖泊中提取沉积岩岩心，并根据检测结果推断，公元750年前后唐王朝开始经历一段相对干旱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不止一次出现以3年为周期的极干旱时期，导致降雨量减少和持续干旱，造成灾荒，进而作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加速唐朝灭亡。豪格还根据从委内瑞拉卡里亚科地区提取的沉积岩岩心样本推断，同一时期在太平洋对岸中美洲出现的玛雅文明最终灭亡，部分也是由于这一因素作祟。豪格等人的研究报告4日发表在英国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当然可以讨论，但其研究方法却是开拓了新材料，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后来看到学术界有人说其结论在我国学者中早已存在，但我想豪格等人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材料来讨论历史学，这是不应抹杀的。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早已说过：“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目 录

序	1
自 序	1
第一章 综论	1
第一节 古有复辅音声母说概述	1
第二节 对古有复辅音声母说的怀疑和批评概述	6
第三节 本书的目的和方法	28
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37
第五节 本书的重要原则和理论阐释	58
第六节 关于用对音材料来研究上古音	77
第七节 关于用方言材料来研究上古音	112
第八节 对基于汉藏语系的汉藏对音的批评	126
第二章 从方法上论上古汉语无复辅音声母	175
第一节 从汉字形体变迁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175
第二节 从六书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192
第三节 从异字同形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204
第四节 从反切的起源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232
第五节 从自反原理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280
第六节 从经典异读异文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301
第七节 从材料的时代性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321
第八节 从连音变读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329
第九节 从训读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339
第十节 从叠韵互音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363
第三章 从音理上辨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	370
第一节 论上古音中来母的音值及其谐声问题	370
第二节 论明母、晓母相谐的问题	395
第三节 论晓母、心母相谐的问题	433

第四节 论复声母 ml 的构拟	446
第五节 论复声母 sn 的构拟	448
第六节 论心母、喻四及舌头音相谐的问题	459
第七节 论来母、心母相谐的问题	470
第八节 论晓匣母、疑母相谐的问题	479
第九节 论透母、晓母相通的问题	490
第十节 论复声母 pl 的构拟	501
第十一节 论复声母 sm 的构拟	510
第十二节 论复声母 mn 的构拟	517
第十三节 论喻四与见系字谐声的问题	524
第十四节 论汉语古音中有腭化声母及重组问题	538
 第四章 音韵学相关问题研究	545
一、再论重唇音轻唇化的年代问题	545
二、“機”的上古音问题	550
三、上古音的去声问题	551
四、长言短言问题	552
五、《老子》“沌沌”的通假问题	553
六、“车”的古音问题	554
七、南方方言中的唇鼻音声母没有轻唇化	555
八、云母字读晓母问题	556
九、音韵学中的“清浊”问题	557
十、“狄”的读音问题	562
十一、沈曾植误解“纽”字	563
十二、真耕通押问题	564
十三、一二四等与三等之间的区别问题	567
十四、“月氏”的“月”的读音问题	568
十五、中唐时期的匣母和喻三读音相近问题	570
十六、再论《切韵》中云母的音值问题	573
十七、上古音中的真耕二部的主元音问题	578
十八、“夥”字的形音结构问题	579
十九、《楚辞》的一处押韵问题	580
二十、“节”的上古音问题	581
二十一、钱钟书误解古音一例	582
二十二、上古音中押双声的问题	583
二十三、梵汉对音中的轻声问题	584
二十四、音韵与避讳问题	585

二十五、中古音里的云母和以母两读问题	587
二十六、战国楚方言音系中的元音构拟问题	589
二十七、王力《汉语语音史》中的提法有不当	590
二十八、王力《汉语语音史》所论音变恐有不当	591
二十九、日母的音值问题	592
三十、去声为入的问题	595
三十一、长入问题	598
三十二、上古音中的浊塞音韵尾的商榷	599
三十三、语音史上入声消失的年代问题	607
三十四、关于清音浊化音变的问题	611
三十五、对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意见	614
三十六、湘方言中表示“给与”的“阿”	618
三十七、上古汉语中“法、废”相通问题	620
三十八、谈《文心雕龙·声律》篇的一个问题	621
三十九、《文心雕龙》札记二则	623
四十、说“熊蹯”	624
四十一、再说中古“虞、模”的音值	625
四十二、论六朝时代的吴方言和楚方言的分野	628
四十三、对王士元《白马非马》的商榷	634
四十四、对汉语研究中字本位理论的意见	635
四十五、“背包”的“背”的读音问题	636
四十六、“李”字的形声结构新考	637
四十七、“股”字的形声结构分析	640
四十八、“搅”的古韵问题	643
四十九、陆机《文赋》的一处用韵	644
 第五章 本书的总结	 645
 跋 叹学问之难	 652
 参考及引用文献	 662
 附录一：何建章教授與《戰國策》研究	 695
 附录二：“司空”新考	 718

第一章 综论

第一节 古有复辅音声母说概述

首先要说明本书讨论的上古音声母的时代具体限定在《诗经》时代至东汉以前^①。远古汉语乃至原始汉语的音韵问题本书不讨论，东汉末年以后的音韵问题也不予讨论。构拟上古音声母的主要材料是形声字，但是利用汉字的“谐声原则”去分析汉字读音的声母，往往会遇到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汉字的谐声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李方桂《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②说：“研究上古音的声母一定要根据中国谐声字的系统来看，中国的谐声字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有些现象现在也没有办法可以解释。”本书要实证性地讨论汉字的形声结构中的若干重要的现象^③，指出上古音声母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辨析一般音韵学家们的论著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并对音韵学上的某些问题作出自己的论述。

从高本汉以来，有相当多的研究上古音声母的学者主张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④。他们列举出了一系列材料用于构拟复辅音声母，认为只有用构拟复辅音的方法才能有效地解释汉字中的一些复杂的谐声现象。现将主张古有复辅音声母的学者的意见大致综述如下：

高本汉主要利用谐声字材料构拟了十九种复辅音声母，如 gl、kl、sl、xl、bl、pl、xm、sn 等。本书将会对其主要依据的材料予以辨析，论证那些材料不能支持复辅音声母的构拟。

林语堂较早地发表了《古有复辅音说》^⑤一文，从联绵字、异文、谐声字的角度论证古有复辅音声母。该文有一个明显的出发点就是利用了西方语言学的方法，但是西方语言学并不完全适应汉语的性质。由于林语堂的文章影响很大，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有时会提到他的文章，将对他文章中的材料予以较为详细的辩驳。

陈独秀《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⑥主要根据谐声字、联绵字、声训和对音材料来论证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最后说：“笃守成说者，或目复辅音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其他学者类似的说法很多，提倡古有复辅音的主要论文大致收入了赵秉璇、竺家宁编的《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⑦。《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的末尾附录有研究复辅音的论著目录，收罗较为详备，我们这里不再一一陈述。^⑧

罗常培等《普通语音学纲要》说：“现代汉语的方言里，我们还没有发现过上面这一类的复辅音。”^⑨但是罗常培对被高本汉、林语堂、陈独秀等人认为是复辅音表现的材料基本上是认可的，该书第 122~123 页倾向于承认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说法。类似的不十分确定的意见也见于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上古声母总论”一节，其文称：“上古有复辅音。其详不得而知，可是能用 kl、

ngl、tl、sl、pl (ml) 当代表音。汉朝以后全失去。”^⑩陆志韦也是面对一些谐声材料不知该如何处理，只好乞灵于复辅音来解释^⑪。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第八章“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说：“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研究，上古汉语确实存在着复辅音声母，这至少有以下十二种证据。”^⑫杨剑桥说的十二种证据是谐声字、声训、读若、反切、重文、异读、音注、异文、方言、联绵词、古文字、亲属语言。他总结说：“由此可见，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实在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唐兰曾经用‘声母的转读’来解释以上一些现象，但是如果‘声母的转读’数量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则上古汉语还能有‘声母’存在吗？显然‘声母转读说’是不能令人首肯的，这种驳论是不能成立的。”^⑬根据我们的研究，杨剑桥排比的十二种证据没有一种可以证明上古汉语必然有复辅音声母，我们将对他说的一些主要证据作考证性的辩驳，指出为什么与复辅音无关。

美国学者罗杰瑞在《汉语概说》中甚至说：“这样一推理，高本汉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即中古音虽只有单辅音声母，而上古音则有复辅音声母。现在谁也不怀疑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而如何确切构拟，却仍有争议。”^⑭邵荣芬先生《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⑮也提到：“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问题虽然早就被提出来了，但在国内引起争论是从高本汉的学说发表以后开始的。起初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比较多。后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汉语方言研究以及同系属语言的比较研究逐渐展开，相信上古有复声母的人日渐多起来。从1980年到现在发表的有关复声母的论文，反对上古有复声母的只有一篇，而同意上古有复声母的不下二十篇。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有明显走向一致的趋势。”郑张尚芳先生在《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二）》^⑯一文中说：“虽然还有少数人怀疑，但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也已成了共识，即使持否定态度而影响很大的王力氏，在《同源字典》中也说‘黑’的古音可能是mxək，故与‘墨mæk同源’（第253页）。问题是要弄清复声母有哪些成分、结构规则及演变条例，高xm、王mx、李hm、张mh，到底应取哪一形式为是，也应有定着。”^⑰他的《上古音系》^⑱第76页“复声母问题”根据汉藏语系中的其他语言的声母情况，认为上古汉语一定会有复声母，他说：“既然同为汉藏语系的藏缅、侗台、苗瑶各语族都是复声母丰富的语言，唯独汉语例外没有复声母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汉语就成了与其他兄弟语言都不一样的怪胎了。观察时代较早的藏文、缅文、傣文、泰文，书面拼式中保留的复声母今读常常单声母化，说明这些语言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复声母简化的过程。因此认为汉语上古阶段有复声母，以后才单声母化，该是合理的推测；汉语应是整个汉藏语言复声母简化过程中发展较快、完成较早的一个模式。”郑张先生的这段论述包含了两个问题：如果古汉语本来有复声母，后来较早地简化为单声母，那么具体早到什么时代呢？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发生复辅音声母单辅音化呢？上古汉语与古藏语、古缅语之间有关系词，这是事实。但是这些关系词到底是同源词还是借词，很多时候非常不容易确定，而且其时代层次也必须认真研究。另外，上古汉语也有复杂的方言，古汉语与古藏缅语之间的借词往往是在古方言中发生，古方言的借词中常常会有一些特殊的音变。我们在利用所谓的汉藏语系来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时候，对所用的材料一定要经过严格鉴别。

台湾学者竺家宁有一本颇有分量的专书《古汉语复声母研究》^⑲，专门系统研究古汉语的复辅音问题，所用的材料主要是谐声字。竺家宁也力主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

虽然上面引述的罗杰瑞的话表明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的观点影响很大，但是事实上并非像罗杰瑞所宣称的“谁也不怀疑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本书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对被学者们用来证明复辅音的

材料进行较大规模的辨析和考证,我们的研究将表明用来证明复辅音的材料其实是不可靠的,这些材料根本不能反映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高本汉以来主张有复辅音的音韵学者对汉字的谐声结构做了过分简单的处理,未能理解汉字的形声结构中所蕴含的异常丰富复杂的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只能用复声母来解释的现象,经过仔细的辨析之后,我们认为其实可以用单辅音声母来解释。

我曾试图对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的意见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为此仔细阅读了关于复声母的著作,结果失望地发现学者们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予以详细的阐释。他们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各种根据可以大致分类归纳如下:

(1) 在古汉语自身的材料中,有许多的谐声字、声训、读若、反切、重文、异读、古代音注、异文、方言、联绵词等材料可以反映古汉语曾经有过复声母。

(2) 从汉藏语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既然汉语与藏缅语系诸语言是亲属语言,有发生学上的关系,也就是汉语与藏缅语在原始时代是同出一源。而无论现代藏语,还是古代公元7世纪以来的古藏文都有复声母,在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缅甸语、泰语等语言中也有复声母,那么作为同系语言的汉语上古音也应该有过复声母。学者们在构拟古汉语的复声母的时候,往往利用相当多的民族语言的材料,主要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语言类型学,另一个是他们认定的同源词。

(3) 现代汉语方言中没有发现复声母现象,那是因为上古汉语经过了数千年的演变。学者不能以今律古,根据今天的方言中没有复声母就说上古汉语没有复声母。

(4) 他们认为自己是音韵学上的审音派,最精于音理。在他们眼中,清代小学家们讲古音通转很多时候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常常批评清儒说的“一声之转”是“无所不通,无所不转”。只有采用复声母的观点,才能避免“无所不通,无所不转”,才合于音理。

(5) 他们还常常利用语言类型学的观点为复声母辩护,认为在印欧语中有复声母是很普遍的。古汉语也是人类的一种语言,应该合于语言的通则,在上古或远古时期存在过复声母。

(6) 由于我国古代典籍浩繁,古文献中常常保留了不少的古代外语的音译词。所以,他们还常常利用古汉语与古代外族语言之间的借词的对音关系来构拟复声母。对音材料是他们经常利用的一件武器。

以上六条是我对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的各种根据所作的概括。以上各种根据的性质和重要性互有不同,最重要的是汉语自身所拥有的大量的谐声字材料。他们认为这些谐声字的读音与其声符的读音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不能用声音通转来解释,而应该用构拟复声母来解释。因为声母之间的通转要有一定的条件,不符合这个条件就不能认为可以通转。然而,声母通转的条件是什么呢?怎样确定呢?是靠人为的假设,还是实事求是地从研究材料本身得出呢?本书将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们的答案将立足于对古汉语各种材料自身的客观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将表明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会背离人们的假设和想象,不是人为的理论所能涵盖得了的。

注释

①原则上包含东汉,但东汉是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本书有时会指出在东汉才出现的新生现象。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80页谈到音韵学分期的时候,认为先秦至汉武帝以前为一期;汉武帝至三国末、两晋南北朝为一期。我们这里论述的上古音包含了章太炎说的第一、二期。

②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③学者们辛勤地制作了《说文》中的所有谐声字的谐声统计表,这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如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

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王珊珊博士学位论文《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第610页所附《说文谐声字统计表》、刘志诚《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系统》(《川东学刊》1995年第3期)根据《金文编》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统计并编排出的《金文谐声总表》和《金文谐声几率统计表》、王文耀《殷周文字声类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一书所载的《重文交换声符声母变化表》都是非常客观的统计工作,提供了声母研究的不少宝贵材料,很值得重视。但是所有这些异文材料也包含了很复杂的情况,我们在利用时也有作慎重的考辨。无论是我国清代的小学家、经学家,还是日本的研究古典的学者,都很重视对文本的考辨工作,这也是本书特别重视的。

④本书采用“复辅音声母”或“复声母”这样的术语,有时也省称为“复辅音”,这只是音韵学界的一种流行的称呼。事实上,本书只是否认汉语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的存在。而在韵母部分,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却有复辅音存在。不过这些特殊的方音大都出现得比较晚,与上古音无关。如据黄家教、崔荣昌《韶关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异》(《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一文介绍了新派韶关方言音系中阳声韵B,也就是存在nt韵尾和ŋ?韵尾,这是一种后起的特殊的阳声韵,恐怕只能看成是复辅音韵尾。据李小凡《释厦门、苏州、庆元(竹口)方言的声调变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的介绍,在吴语南部方言的竹口方言中的古全浊声母的平声字由于当地方言中的单字调系统与连调系统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生了入声化的音变,产生了喉塞音尾,其中阳声韵字也带上了入声尾,如[ŋ?].这就产生了复辅音韵尾。严学窘《新喻市方言词读音成分的层次性》(《严学窘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描述了赣方言中的新喻市水北乡方言中的阴平调存在大量开韵尾和-ŋ尾带有[ʔ]尾的词语,如张toŋʔ、汤t'oŋʔ、刚koŋʔ、康k'oŋʔ、邦poŋʔ、江p'oŋʔ;还有n尾韵加带t尾,例如班punt、攀p'unt、翻fant、真tint、听r'int等等;还有阴平m带p的,例如张tomp、双somp、央iomp、光kuomp、荒fomp、汪uomp等等。祝敏鸿《通城方言入声的特点》(《语言研究》2002年增刊)也论述到鄂东地区的通城方言中有入声尾ʔn,主要来自中古音的咸山摄入声字和臻深摄合口入声字,极少数来自曾梗摄细音入声字。通城方言还有收ŋ?的入声韵母,即iŋʔ、uŋʔ、əŋʔ,只出现在少数口语词中,往往表示“少、小”的意思,其来源尚不明朗。这些带鼻音的入声字是白读音。这样的问题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复辅音韵尾都是各自的方言中后起的现象,与上古音无关。如通城方言中的入声尾ʔn,一般与中古音合口的t尾相对应。因而其音变的过程也许是t→ʔ→ʔn,这样的音变不会存在于中古以前。

⑤林语堂:《语言学论丛》,《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九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陈独秀:《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

⑦赵秉璇、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⑧其中收入的严学窘的《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旁征博引,材料最为丰博,构拟的复辅音也最多,然而其材料也最为驳杂,缺少审辨,其所用材料大都不能证成其说。就是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也对严学窘此文颇有批评,如郑张尚芳、潘悟云等人。

⑨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2页。

⑩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82页。

⑪在较早期的著作中,潘尊行《由反切推求史前中国语》(载《新月》1929年第二卷第2期)一文也是主张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此不详引。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页对潘尊行此文作了介绍,可以参看。何九盈先生评价潘尊行之文曰:“潘文并不长,论证亦欠深入,不过他提出的这些课题,确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复声母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就影响到了古文字学家。如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三章“汉字的结构”第55页就相信古有复声母说。历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相信古汉语有复声母的观点。

⑫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⑬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⑭(美)罗杰瑞著,张惠英译:《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⑮邵荣芬:《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06页。

⑯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二)》,《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第8页。

⑰其他学者如唐作藩先生在《从同源词窥测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